特朗普第二任期亚太战略初探^[1]

牛筱萌 袁 征

【内容提要】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其第二任期的亚太战略将呈现出战略延续性与动态调整性交织的特征。在延续性方面，特朗普政府将继续继承美国过往亚太战略的结构性框架：一是沿着地缘重心东移的传统路径，持续维持对“印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二是坚持对华竞争范式，遏制中国崛起仍将是该战略的主基调；三是继续强化“美国优先”下的有条件盟伴关系。在动态变化方面，特朗普政府将做出三重调整：一是将西半球地缘博弈纳入战略视野；二是强化对华政策的交易性特征；三是应对区域内国家对冲策略的影响。中美关系将在这些延续与调整的背景下，步入一个更具不确定性的脆弱周期。

【关键词】特朗普政府 亚太战略 对华政策 美国优先 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牛筱萌，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5) 01-0001-20

[1] 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2025年1月，特朗普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其重返白宫正值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加速重构的关键阶段——乌克兰危机陷入战略僵持、中东局势动荡不安、大国博弈持续加剧。相较于首任期“破”多于“立”的政策实践，其第二任期的亚太战略将既呈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又蕴含着动态调整空间。这种战略延续性与政策动态变化性的双重特征，不仅将深度重塑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更使中美关系面临经贸、科技、军事等多维度博弈升级的系统性风险。本文通过梳理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历程，审视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亚太战略特别是遏华政策举措的实施情况，并结合其竞选期间的言论、再次就任总统伊始相关政策动向以及当前美国国内外环境，对特朗普第二任期亚太战略及对华政策的可能取向作初步的分析，为学界和实务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历史是一面镜子：特朗普第一任期亚太战略回顾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构想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并受到现实因素的驱动。

（一）特朗普亚太战略基调：国内变化与初步调整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日益成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该地区愈发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经历了复杂而持续的历史过程。总的看，历届美国政府都因时因势调整亚太战略，这些调整在战略侧重点和手段上虽有差异，但核心目标——维护美国的地区主导权——却始终如一。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已着手开始将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对亚太地区基于“接触与扩展”的总体思路，加大经济参与、军事存在及美式民主价值观推广力度，以巩固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权”。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秉承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思维，力求彰显并扩大美国的实力优势。

然而，“9·11”事件的发生迫使小布什政府将反恐置于国家安全的首位，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注意力与资源投入，但美国仍提出将60%的海空军事力量投向该地区。

自称为“太平洋总统”的奥巴马执政后，深刻认识到美国在两场反恐战争中过度投入，消耗了大量战略资源。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但中国却在这场危机中发挥了关键的定海神针作用。美国忙于反恐，而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却突飞猛进，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快速崛起让美国产生了战略焦虑，促使其加快调整全球战略布局。继第一任期宣布“重返亚洲”之后，奥巴马第二任内又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该战略主要包含经济和安全两大方面：经济上，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利用数字经济、知识产权等高标准条款，力图构建排斥中国的贸易体系；安全上，着手落实将60%海空兵力部署到亚太地区，推动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升级，策动所谓“南海仲裁案”，向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派出轮驻部队，持续强化对华战略挤压。^[1]

到奥巴马第二任后期，美国战略界就应继续沿用自尼克松时代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还是转向更为强硬的对华“遏制”立场，展开了激烈的政策讨论。^[2]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没有动机去颠覆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因此主张通过制度性对话管控分歧。^[3]但也有观点表示，中国正在构建一系列替代性制度，试图挑战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4]这种争论本质上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双重

[1] Kurt M. Campbell, *The Pivo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Statecraft in Asia*, New York: Twelve, 2016, pp.11-28.

[2] Zalmay Khalilzad, “The Case for Congagement,”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150, 2017, pp.15-20.

[3]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WW Norton, 2015, p.34.

[4] Stephen G. Brooks, Wiliam C. Wohlfort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s ris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global posi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0, No.3, 2016, pp.7-53.

逻辑长期矛盾的延续。在此背景下，2016年特朗普凭借“美国优先”口号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其核心支持者——美国中西部白人蓝领群体将产业空心化和工作流失归咎于全球化和中国，而宗教右翼与反建制派则抵制 TPP 等“精英主导的多边主义”。^[1] 特朗普在 2017 年 1 月就职后，随即将纠正贸易失衡列为重要目标，并坚信“保护将催生繁荣与力量”。^[2] 可以说，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以及逆全球化力量的持续发酵，为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重构其亚太战略奠定了基调。

（二）由亚太到“印太”：特朗普第一任期“印太战略”的实施与影响

特朗普上任后着力兑现竞选期间的核心承诺，退出了 TPP、《巴黎协定》等一系列多边安排和国际组织，将削减贸易逆差作为施政重点。他多次宣称，巨额贸易逆差不仅削弱美国经济竞争力，还危及军事实力，并将矛头指向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

为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第一届特朗普政府逐步形成了以遏制中国发展和影响力上升为主线的“印太战略”。2017 年 10 月，时任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下个世纪的美印关系”演讲中首次抛出特朗普版“印太”概念来界定美国亚洲战略框架中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地缘政治区域，将中国定位为“破坏国际规则的修正主义国家”，强调了美国与印度合作的重要性；同年 12 月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自由开放的印太”写入国家战略顶层设计，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系统重构亚太战略框架。^[3] 进入 2018 年，相关战略部署加速推进：1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强调将采

[1] Lawrence J. Lau, *The China-U.S. Trade War and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9, p.169.

[2] The White House, “The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the-inaugural-address/>.

[3]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8,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取更积极手段应对中国崛起^[1]；3月，特朗普依据301调查结果，签署对华加征关税备忘录，正式开启对华贸易战。至2019年，战略体系进一步成形：6月国防部《印太战略》报告与11月国务院《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文件相继出台，系统阐释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维度的战略实施路径。^[2]这一系列政策演变清晰表明，美国对华战略已从传统的“接触+遏制”二元模式，全面转向以遏制中国为核心、多领域打压为手段的新阶段。

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更加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对华遏制打压开始成为美国对华关系的“主旋律”和美国亚太战略的“主题曲”。在经贸与科技领域，美国采用极限施压手段，恣意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通过加征关税、扩大外资审查法案适用范围、将众多中国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等方式，力图阻碍中国发展。在军事领域，强化与盟友军事合作，在南海开启常态化“自由航行行动”与军事演习，推进“太平洋威慑倡议”（PDI），升级第一、第二岛链战力，并通过提升美印防务合作关系积极拉拢印度，着力强化对华军事围堵。在外交领域，重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大力兜售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价值观，企图削弱中国的地区影响力。^[3]另外，特朗普第一任内还大肆干涉中国内政，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2019年台北法案”（全称“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等多个涉台恶法，批准对台军售超过180亿美元，使其成为一个任期内对台军售总额最高的美国总统^[4]；以所谓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January 19, 2018, <http://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ly 1,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Shared Vision*, November 4, 2019,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Open-Indo-Pacific-4Nov2019.pdf>.

[3] 仇朝兵：《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载《美国研究》2019年第5期，第9页。

[4] 《“断交”43年107笔对台军售，美国一心将台湾民众推向火坑》，环球网，2022年4月8日，<https://m.huanqiu.com/article/47W2375dYID>。

“人权问题”为由，恶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捏造“强迫劳动”甚至“种族灭绝”谎言，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上述相关举措彰显出特朗普第一任内竭力企图在所谓的“印太”地区打造一个以遏制中国为核心的多维度战略包围体系，以构建一个美国能够持续主导的地区秩序。然而，特朗普的“印太战略”过度侧重于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致使中美关系日益紧张，同时增加了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加剧了区域合作机制的碎片化，迟滞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削弱了国家间安全互信基础，促使地区中小国家在安全依赖与战略自主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从而重塑着亚太秩序的发展轨迹。

与此同时，特朗普第一任推行的“印太战略”既延续了美国维护地区霸权的战略传统，又融入了由民粹主义驱动的保护主义这一新变量。特朗普政府退出 TPP 等多边框架，转而采取单边施压、向盟友转嫁责任的做法，这使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对其信任度有所下降，其“印太战略”的执行效果以及可持续性都遭到了质疑，特别是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的单边政策，往往通过牺牲对方利益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美国与日本、韩国等地区盟友的内部矛盾，导致美日、美韩在经贸、安全等领域的政策分歧有所上升；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各国因忧虑被卷入美国挑起的零和博弈而不同程度地采取了在大国间寻求平衡的对冲策略。

二、特朗普第二任期亚太战略的延续性分析

特朗普在第一任内秉承“美国优先”理念，对外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浓厚，与美国传统上的自由国际主义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由于美国固有的维护全球和地区霸权的战略惯性，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将不可避免地延续美国在该区域形成的结构性框架。

（一）亚太地区仍将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

美国的亚太战略始终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上讲，鉴于

欧洲、中东及亚太地区长久以来对美国国家安全与战略利益特别是其霸权护持的深远影响，美国在规划国家安全战略时，必须对战略资源展开周密规划与部署，力求有效均衡这三个关键地区的战略需求。^[1]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世界多极化趋势加速，“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乌克兰危机延宕与中东冲突此起彼伏，西方民主体制面临内部危机，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对美国如何合理分配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应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挑战”，对亚太地缘政治主导权的偏执诉求，以及该地区作为全球最强劲增长极的经济引力，始终构成美国对亚太战略投入持续加码的底层逻辑。

从历史维度审视，自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之后，亚太地区便已成为美国外交战略中的优先考量。美国国安会前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迈克尔·格林（Michael J. Green）在其2017年的著作《天意之外》中指出，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战略重心在于确保太平洋成为“美国思想与商品向西流通的通道，而非威胁向东侵袭本土的门户”。^[2]特朗普首任期间，尽管曾以“美国优先”原则批评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偏离重点，并对一些“束缚美国、削弱其实力的国际联盟”表示怀疑，但他并未完全抛弃奥巴马时期的亚太战略，而是将其中的部分内容融入到自己的“印太战略”之中，从而使其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实质上保持了与前任的连续性。^[3]为了强调需要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防务资源来应对“大国竞争”，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摒弃了过去的“两场战争构想”——即确保美国有能力同时应对两场地区性战争——转向聚焦与中国、俄罗斯这两个“同级别对手”的长期战略竞争。^[4]

[1] 左希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全球再平衡》，载《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10期，第5页。

[2] Michael J. Green, *By More Than Providence: 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

[3] Bilahari Kausikan, “Asia in the Trump Era: From Pivot to Peril?”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3, May/June 2017, p.146.

[4] Jim Mitre, “A Eulogy for the Two-War Construc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41, Issue 4, 2018, p.7.

在2024年的总统竞选中，特朗普多次明确表示有意迅速解决乌克兰危机。他认为，美国在这场冲突中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实际获得的战略收益却相对有限。再度就任美国总统后，特朗普迅速推动美俄接触，围绕俄乌停战、美俄和解等议题展开谈判。可以说，特朗普的积极行动，既是出于兑现“美国优先”的选举承诺来迎合基本盘选民，也反映了其希望让美国从这场代价高昂的冲突中脱身、将战略重心转向更为关键的亚太地区的意图。特朗普的核心决策班子更是如此，无论是副总统万斯（J.D. Vance），还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Mike Waltz）等高官都主张尽快结束俄乌战争，从欧洲收缩力量，集中精力转向亚太和对付中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也着重强调了“印太”地区的关键地位，并多次宣称美国对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盟伴国家的承诺将“坚定不移”。^[1]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亚太地区战略布局的调整，绝非简单的地缘政治转移，而是有着复杂且深刻的根源。当下全球经济重心持续向亚太倾斜，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重塑着世界经济与政治版图。特朗普清楚认识到，掌控亚太地区，不仅能在经济上巩固其全球贸易与金融优势，还能在政治和军事上遏制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考量，不仅是对当下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应激反应，更是美国长期以来霸权思维的延续。

（二）遏压中国将继续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主基调

如前文所述，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前后，美国国内曾广泛讨论过对华政策方向。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曾频繁在各种场合和平台发表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导致对华政策的辩论明显向鹰派倾斜。正如美国创新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加勒特·约翰逊（Garrett Johnson）所言，“特朗普以一己之力，将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提升为全国性的热议话题”。^[2]虽然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失利而“离场”四年，但他的对华负面认知仍持续对美国政界和社

[1] 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Confirmation Hearing for Marco Rubio,” January 15, 2025, <https://www.foreign.senate.gov/hearings/nominations-01-15-2025>.

[2] Natalie Sherman, “Why tech bros are turning to Trump,” BBC, July 24, 2024,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d1j8dvw73lo>.

会产生影响。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进入“深化拓展阶段”。^[1]拜登政府表面上倡导“合作多边主义”，实际上却在强化并扩充针对中俄等竞争对手的联盟体系，通过意识形态划线与阵营对抗重构美全球战略布局。这种战略转向推动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实现系统性升级与扩容。^[2]2022年2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不仅将中国明确界定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和挑战者”，还提出通过军事部署、经济协作和技术封锁等所谓“全政府”“全社会”“全联盟”的全方位手段遏制打压中国的路线图。^[3]为此，拜登政府竭力拓展其盟伴网络：在安全领域，升级QUAD，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在亚太地区原有的轴辐体系基础上大力推进美日澳、美日韩、美日菲等多个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并使之提升至准同盟的水平。^[4]在经济领域，通过供应链重组、投资审查和贸易壁垒等途径，不断加大对华“脱钩断链”力度。在科技领域，以“小院高墙”^[5]策略对华“精准封锁”关键和尖端技术领域，频繁使用“长臂管辖”手段，制裁和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并着力构建排华性议题同盟，如限制半导体技术对华输出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 4）、美日荷对华半导

[1] 赵明昊：《对焦中国的拜登政府全球战略调整》，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24期，第24页。

[2] Alfredo Toro Hardy, “Trump followed four years later by Trump: Would America’s trustiness and system of alliances survive?” *Peninsula Journal of Strategy and Policy*, Vol.1, Issue 1, 2024, p.159.

[3]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4]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Two Years Later, What Has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chieved?” February 15, 2024, <https://www.usip.org/publications/2024/02/two-years-later-what-has-indo-pacific-strategy-achieved>.

[5] 即在维持一般性经贸往来的同时，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尖端技术的产业链实施“高墙式”隔离。参见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pril 27,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remarks-by-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on-renewing-american-economic-leadership-at-the-brookings-institution/>.

体出口管制协议等。相较于特朗普政府的单边施压，拜登政府更注重通过“拉帮结派”的方式编织多层联盟网络来构筑遏华“统一战线”。^[1]

在2020年大选中落败并将责任无端归咎于中国的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期间扬言要通过设置贸易壁垒来“彻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再度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久，特朗普以芬太尼等问题为由，先后两次宣布对中国输美产品分别加征10%关税；颁布了针对钢铝进口的25%关税令，并提出“对等关税”计划；此外，针对汽车、半导体和药品等商品的关税政策也在筹划当中。相关措施及计划都将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从未停止对中国采取极端贸易措施的步伐，包括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MFN)地位。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若美国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可能对中国商品实施歧视性和单方面的贸易关税，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

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特朗普第一任期间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划限设障，力阻中国科技进步。拜登政府延续了该政策取向，着力封堵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战略前沿技术，打压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光伏等技术优势产业。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势必继续秉持对华强硬立场，在既有“小院高墙”框架上持续加码。2025年2月21日，美国白宫网站发布“美国第一”投资政策备忘录，宣布将调整美投资政策。根据该备忘录，美国将进一步限制与中国的双向投资，包括运用所有法律工具限制与中国有关联的个人或实体在美国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农业、能源及原材料等战略性行业的投资活动^[2]，标志着美国对华技术封锁将进入更加严苛的新阶段。

在安全领域，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也将进一步在台湾、南海等敏感问题

[1] 滕建群：《论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选择》，载《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6期，第21页。

[2] The White House, *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 February 21,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2/america-first-investment-policy/>.

上挑衅滋事，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例如，2025年2月，美军驱逐舰和测量船公然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国务院网站修改“美台关系事实清单”，撤掉了先前“不支持台独”的表述，在涉台问题上立场严重倒退，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美国还派出两架B-1B战略轰炸机与菲律宾军机在南海实施所谓“联合巡逻”，并悍然飞越中国黄岩岛，粗暴侵犯中国主权。未来一个时期，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议题上给中国制造更多“麻烦”，为的是进一步博取国内对华强硬派的支持，并以此为抓手，达到遏制中国发展和逼压中国在美国关切议题上让步的目的。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随即大力推动美俄和解，被美媒普遍视为要“在中俄之间打入楔子，以便美国腾出手来对付中国”。^[1]

（三）“美国优先”下的有条件盟伴关系将继续强化

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战略布局中，其盟友和伙伴始终是重要的战略支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盟伴体系将延续并强化“美国优先”导向下的“有条件合作”模式。

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将进一步推动盟友承担更高成本与责任：美日同盟的核心地位保持不变，但日本需“根本性强化防卫能力”，包括升级联合指挥体系、增加西南诸岛部署并分担更高比例的驻日美军费用；韩国同样面临美国要求其增加军费分摊比例的压力，同时需在对朝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这种“责任分担”逻辑也被延伸至技术捆绑，美国将继续通过“芯片四方联盟”、美日荷半导体出口管制等机制，迫使盟友与伙伴切断对华技术合作，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科技复合”依赖。^[2]

与此同时，经济与技术领域的“排他性捆绑”将是巩固盟友网络的另

[1] Alexander Clackson, “Integrating Russia into the Western security framework is key to long-term stability,” *The Hill*, February 20, 2025,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153709-russia-western-security-dialogue/>.

[2]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JAP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S, February 7,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02/united-state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

一抓手。拜登政府时期以《通胀削减法案》等单边政策为杠杆，要求日本、韩国加入“友岸外包”体系，减少对中国稀土和新能源供应链的依赖；东南亚国家若想获得美国基建投资，则需承诺排除华为5G等中方技术。^[1] 这些做法很可能会在特朗普第二任内得以延用，特别是技术垄断的意图将更为赤裸——美日联合研发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时，美国可能要求共享成果并限制对华转让，试图通过规则主导权将盟友锁定在美国的技术轨道内。这种所谓的“去风险化”策略本质是重塑盟友对美国的单向依赖，例如，通过能源合作扩大美对日液化天然气出口，将经济纽带转化为地缘政治筹码。这一路径将延续以利益交换巩固盟友网络的逻辑，以确保美国在亚太战略格局中的核心主导地位。

除传统盟友外，印度在特朗普第二任内“助美制华”的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凸显。拜登政府时期，印度对俄罗斯的立场给美印深化关系带来一定阻碍。但进入特朗普政府时期，美俄关系有望逐步缓和，这一问题不再是制约美印合作的主要因素。特朗普再次上任后不久便与印度总理莫迪达成协议，深化美印在经贸、防务、技术和能源安全等领域合作，包括：计划到2030年将双边贸易额增加至5000亿美元，较原有规模翻倍；2025年内签署未来10年“21世纪美印主要防务伙伴关系”（U.S.-India Major Defense Partnership）框架，重点推进陆海空及太空、网络等各领域的军事合作；推出所谓美印“战略技术应用关系转型”（U.S.-India TRUST）倡议，加强关键和新兴技术合作；通过扩大油气贸易和核能技术转移等途径，强化双方能源纽带；以海底光缆基建和多国海军协作等为抓手，增强在印度洋的军事部署与区域控制力，巩固美国的战略存在，等等。^[2] 此外，美印在印度洋地区形成的经济技术合作模式——通过强化供应链、提升互联互通及加强

[1]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 <https://www.irs.gov/inflation-reduction-act-of-2022?os=fuzzscanL12tr&ref=app>.

[2]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INDIA JOINT LEADERS’ STATEMENTS,”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2025/02/united-states-india-joint-leaders-statement/>.

技术合作来抗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将扩展至澳大利亚和日本。这种合作机制既通过双边渠道推进，也依托 QUAD 多边框架展开，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以安全为导向的战略形成互补，从而在“印太”地区形成更为立体的对华战略遏制布局。^[1]

总之，亚太地区对美国维护霸权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不遗余力地遏制打压中国，这已成为其加强与亚太地区关系的主要驱动力。此外，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的盟伴体系，也旨在为其全球和其他地区战略提供有力支撑。这种地缘重要性认知、对华遏制政策导向以及盟伴网络建设，既相互联动又彼此强化，共同构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亚太战略的稳固基石。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亚太战略的动态变化性分析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亚太战略在延续美国外交传统及其第一任期基本逻辑的基础上，也可能面临一些策略调整甚至反复。

（一）跨区域战略联动加剧，或重构两洋角逐格局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亚太战略呈现出一种更具扩张性的“双线联动”特质，其显著变化在于将西半球（尤其是拉丁美洲）前所未有地纳入对华竞争的全局框架，打破了传统亚太战略的地理边界。尽管西半球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亚太范畴，但特朗普政府通过重新定义“威胁来源”和“利益边疆”，将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存在与美国的本土安全议题捆绑，形成了一套横跨太平洋的战略叙事。自 2017 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指责中国通过投资“渗透”西半球以来，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漠视”逐渐转向“战略警惕”，但这一进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仍显迟缓——他不仅缺席美洲峰会，甚至公开质疑拉美国家的合作价值。然而，随着中国与拉美经贸关系的扩大，

[1] Vivek Mishra, “Trump 2.0 Could Recalibrate U.S. Indo-Pacific Engagements,” The Stimson Center, November 9, 2024, <https://www.stimson.org/2024/trump-2-0-could-recalibrate-u-s-indo-pacific-engagements/>.

且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巴拿马运河、锂矿开采等战略领域，特朗普团队开始意识到：放任西半球的“权力真空”使中国得以掌控贯通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咽喉要道”。^[1]这种焦虑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迅速转化为激进政策：从威胁收回巴拿马运河控制权、重启对古巴的“恐怖主义国家”指控，到授权国务卿鲁比奥以“美洲优先”为名强化对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国的施压，其核心逻辑是通过复活“门罗主义”的地缘控制，阻截中国在西半球的布局，进而为亚太方向的对华压制提供侧翼保障。

这一战略调整的背后，是经济安全与地缘控制的复合考量。特朗普政府将西半球定位为“近岸供应链重组”的关键区，试图把亚太产业链“去中国化”与美洲产业链“再美国化”同步推进。鲁比奥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直言，美国必须用“共同繁荣”替代中国“空洞的承诺”。^[2]其背后算计是：当拉美国家因对美经济捆绑而丧失与华合作空间时，中国在亚太的“一带一路”支点也将被间接瓦解。这种跨区域联动的算计，恰恰暴露了美国战略界的深层恐惧——中国在拉美的港口、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在未来形成一条从太平洋东岸直抵南海的“影响力链条”，使美国陷入在太平洋两端受战略挤压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西半球加强地缘控制与亚太方向以遏制中国为重心的战略联动，本质上源于国内政治矛盾向外交领域的延伸。通过将非法移民、芬太尼危机等国内治理难题转化为对拉美国家的施压工具——例如以移民遣返置换市场准入、将贩毒集团定性为“恐怖组织”——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不仅意在转移国内舆论焦点，更希冀借此强化对西半球的控制。这种“内政问题战略化”的模式，与美国历届政府长期在亚太地区炒作台海、南海议题以煽动美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手法形成呼应，共

[1] Michele Kelemen, Eyder Peralta, “Three things to know about Rubio’s first international trip,” NPR, February 1, 2025, <https://www.npr.org/2025/02/01/nx-s1-5273541/marco-rubio-makes-first-tour-to-latin-america-as-secretary-of-state-starting-in-panama>.

[2] Marco Rubio, “Marco Rubio: An Americas First Foreign Polic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30, 2025, <https://www.wsj.com/opinion/an-americas-first-foreign-policy-secretary-of-state-rubio-writes-western-hemisphere-too-long-neglected-a81707b0>.

同构成跨区域联动的政治基础。然而，这种双线并进的策略也将面临结构性矛盾：当特朗普政府试图同时维持亚太“前沿阵地”的军事投入与西半球“后院”的地缘控制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两线博弈效能的内耗。原本互为犄角的联动设计，反而可能演变为相互掣肘的战略负担。

（二）对华交易性外交政策特征或更加突出

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外交政策的交易性特征有可能更为突出，成为其亚太战略调整的关键动向之一。与其第一任期频繁使用关税武器、以极限施压制造对抗氛围不同，其新任期的对华策略虽仍以“美国优先”为内核，但操作手法或将转向更具灵活性的交易模式。这种转变既源于其首任期间强硬政策的实际效果偏离预期——关税战导致中美经济俱损、科技封锁反而加速中国自主创新，也受到美国内政治力量重组及全球实力对比变化的双重驱动。特朗普决策班子内部“新保守主义派”“美国优先派”与“交易主义派”的博弈，则为这种转向提供了结构性支撑。

“新保守主义派”坚持将中国视为必须遏制的“战略威胁”，主张强化前沿军事部署、废除军费限制法案以保持对华威慑。然而，该派扩张性军事主张与特朗普未来5年每年削减8%国防开支的计划存在直接冲突。^[1]“美国优先派”的孤立主义倾向与全球利益攫取需求形成张力：副总统万斯反对对乌援助而主张聚焦“中国挑战”，然而这一收缩意图面临现实制约：特朗普仍需维持“印太”盟友体系以制衡中国，这要求其在“收缩”与“交易”间寻找平衡点。真正主导政策走向的是深具特朗普个人风格的“交易主义派”。该派将国际关系简化为可量化的利益置换，其操作逻辑在特朗普首任期间已初现端倪：通过重构《美墨加协定》迫使加墨接受“毒丸条款”，借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撬动千亿美元军售订单。这种将复杂地缘政治问题转化为商业谈判的思维，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试图推动美国和乌克兰达

[1] Filip Timotija, “Hegseth’s proposed Pentagon cuts, firing of generals: What to know,” *The Hill*, February 20, 2025, <https://thehill.com/policy/defense/5156006-hegseth-defense-budget-cuts-what-to-know/>.

成所谓“以矿产资源换安全保障”协议等事例中再次得到印证，并可能被系统化升级为对华政策框架——既延续贸易保护和科技封锁政策，又在芬太尼管制、朝核问题等方面寻求“有条件的合作”。特朗普还可能施压日韩增加防务开支，同时向中国释放谈判信号，以“避免冲突”为名要求中方在经贸等方面让步。这种看似矛盾的“混合策略”，本质是交易性外交的精髓：通过制造危机杠杆抬高要价空间，最终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安全与经济协议。其虽含有较多讹诈成分，但可能会更倾向以“达成妥协”为导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特朗普决策班子内部三大派系在战略路径上存在分歧，但“对总统忠诚”的共同点及“美国优先”的总体框架，使得特朗普政府既能保持对华强硬底色，又可通过选择性妥协换取实际利益，形成更具弹性的竞争和施压模式。更深层地看，交易性倾向折射出美国相对实力下滑与中国反向塑造能力提升的结构性对比。从2018年起，中国通过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提升产品附加值来缓解关税压力；对内则针对性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以降低外部依赖。面对技术封锁与贸易限制，中国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自主创新，在半导体、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取得显著突破。同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深化与各国经贸合作，逐步构建起多元化的市场格局。^[1]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对华交易性外交政策的转向既源于现实压力，也暗含对中国反制能力的隐性承认。

（三）不得不应付更多亚太国家的对冲策略倾向

当前，亚太格局演变受到内部和外部双重因素的驱动，逐渐形成多维对冲格局，这一态势对美国“印太战略”的既有框架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内生动力来看，近年来亚太地区产供应链价值链加速重组。在RCEP框架下，区域内国家的贸易依存度达到历史新高。而外源压力主要体现在

[1] Yu Xiang, “Is China’s Economy Ready for the Trump Shock? China-US Focus,” November 22, 2024, <https://www.chinausfocus.com/finance-economy/is-chinas-economy-ready-for-the-trump-shock>.

美国政策施行中的“工具化”甚至“武器化”倾向上。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理念，更倾向于双边交易而非多边机制协调，搞所谓“对促进美国利益无益就退群”“为了美国利益就可牺牲其他方利益”。例如，鲁比奥拒绝参加 G20 外长会，这一行为充分暴露了美国将国际和多边机制当作交易工具的本质；在巴以问题上，特朗普再度上任后对以色列一边倒的支持，无视巴勒斯坦和伊斯兰世界的正当要求，已经引发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在心理上逐渐疏远美国。^[1]

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区域内国家差异化对冲策略将可能进一步被触发。与特朗普首任时期相比，亚太国家现在对他有了更充分的准备。以日本和韩国这两个美国的核心盟友为例，随着特朗普卷土重来，日韩也展现出一定的战略对冲特征。石破茂上台后，一方面强化美日同盟，另一方面积极调整对华政策，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必须保持稳定”。面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日本担心自身利益受损，存在借发展对华关系来对冲美国单边主义行动的可能性。韩国近年来曾一味媚美日而疏远中国，但也越来越意识到在经济上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不容忽视，深知“疏远中国的代价不可承受”。^[2]倘若美国继续强压韩国加入对华技术封锁甚至军事围堵，韩国将进一步陷入两难境地，不排除采取一定的在大国间寻求再平衡的策略，进而致使美韩同盟向心力受损。

再以倾向于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战略的东南亚国家为例。美国作为东盟地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特朗普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将冲击其在区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促使东盟各国对美国资金回流国内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惕。为避免因美国投资减少而给自身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1] Joseph Rachman, “Gaza Is a Burning Topic for Southeast Asia’s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29,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12/29/gaza-israel-hamas-war-southeast-asia/>.

[2] Michelle Ye Hee Lee, “South Korea’s likely next leader wants warmer ties with China, North Korea,”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5/02/14/south-korea-lee-jae-myung-interview/>.

东盟可能会积极行动，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等举措，加大吸引中国、欧盟、日本、韩国和中东国家投资的力度，进一步推动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的多元化。^[1]而对于在“印太”概念中尤为重要的印度来说，虽然借助“印太”提升了战略能见度，但美国“一视同仁”的关税政策以及移民政策收紧导致侨汇缩水和技术人才流动受阻，也可能迫使莫迪政府调整对美合作节奏。^[2]

综上所述，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亚太战略可能会呈现三重值得关注的动态变化：在地缘布局上突破传统亚太边界，将西半球纳入对华竞争框架；在政策目标上偏重交易性外交，以利益置换替代全面对抗；在盟友体系中还需应对域内更多盟伴国家在大国间采取对冲策略的局面。三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美国未来一个时期战略调整的突出特征。

结 语

2024年大选共和党取得的“全面胜利”，无疑为特朗普在未来一个时期的执政道路铺设了更为坚实的政治基石，其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可谓攀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预示着未来几年可能会迎来“特朗普主义”的进一步高涨，同时，特朗普在外交决策上也将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与灵活性。然而，尽管特朗普的言辞和立场激进，且其第一任内的许多外交决策也绝非审慎，但其外交政策实际上仍深深根植于美国长期以来在国际秩序中对“超强实力”和“领导地位”的顽固追求。因此，在处理亚太事务时，由于该地区对美国护持霸权的重要性，即便是以反复无常著称的特朗普，也会倾向于

[1] Melissa Cyrill, "Southeast Asia's Balancing Act in a Second Trump Presidency," ASEAN Briefing, November 20, 2024, <https://www.aseanbriefing.com/news/southeast-asias-balancing-act-in-a-second-trump-presidency/>.

[2] M. A. Hossain, "Trump 2.0: Shaping Asia's Future in a Shifting Geopolitical Landscape," *South Asia Journal*, January 19, 2025, <https://southasiajournal.net/trump-2-0-shaping-asias-future-in-a-shifting-geopolitical-landscape/>.

保留历届政府亚太战略中的核心要素。同时，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亚太战略不仅是对以往政策的延续和发展，还可能出现将西半球纳入亚太框架以及对华交易性政策特征更加突出等变化。而特朗普本人多变的性格、其决策团队内部的相互制衡、中国反向塑造能力的提升等因素，将可能使美国面临需要不断调整亚太战略的局面，甚至可能引发其战略层面的突然转向。

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态的明显右转，其第二任内很可能会实施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更浓的政策举措。这对于亚太地区——世界上众多高度依赖贸易的经济体聚集地以及缺少一个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安全架构的地区——而言，无疑将构成严峻挑战。同时，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如何对待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框架，并进一步影响地区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特朗普团队频繁发表对华强硬的言论，采取遏制打压中国的举措，将不可避免地加剧中美之间已然紧张的关系。可以预见，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中美关系将更加脆弱，两国间的矛盾斗争将广泛涉及经贸、科技、军事、金融以及人员交流等诸多领域。同时也要看到，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也并非能够完全掌控局势。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各国利益相互交织、相互依存，往往需要通过对话和妥协才能达成最优解。因此，美国在外交事务中的行动空间和控局能力仍将是有限的。此外，美国承诺一定程度上的不明确性特别是其自私自利的意图，将进一步加剧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国际社会对于不稳定和不安全状况的担忧。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中美之间的互动过招，其本人及美国当局应当认识到中美关系并非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竞争”关系与零和博弈，相反，中美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更加契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一方面，尽管中国被美国视为对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者”，但同时也是美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关键力量，对维护世界稳定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脱钩断链只会对双方利益都造成损害。另一方面，在美国总体实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其外交和安全战略也面临着维护霸权野心与可用手段不相匹配的困境。这些都将成为新

一届特朗普政府不得不正视的现实。

对中国来说，美国不断强化对华遏制打压已成为必须冷静分析和妥善应对的常态。为此，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品行，以及“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气度^[1]，在坚守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选择和发展权利这四条不容挑战的红线基础上，主动发掘积极因素，官民协力、多措并举，着力引导两国关系向健康稳定、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为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繁荣与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积极贡献。

【收稿日期：2025-01-20】

【修回日期：2025-02-27】

（责任编辑：王霄巍）

[1] 《王毅谈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立场》，外交部网站，2025年2月15日，https://www.mfa.gov.cn/web/wjdt_674879/wjbxw_674885/202502/t20250215_11555644.shtml。